

《文选》中《楚辞》篇目的入选依据探赜

张智涵 田子扬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作为中国现存的编选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不可不谓为后世的文学选本树立了典范,甚至发展出了一门新的学问——选学。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文人集团对周至六朝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选择,最终将七百余首作品按照文体进行分类,编选成了《文选》,而在对作品进行选择时,萧统也有较为统一的分类依据,所以《文选》存在楚辞类篇目入选而并未选全的情况。

关键词: 《文选》; 萧统; 《楚辞》; 选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11

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对周至六朝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编选,成《昭明文选》凡六十卷,其中,楚辞类作品主要集中于第三十二、第三十三两卷,收录篇目的具体情况为第三十二卷:《离骚经》一首;《九歌》四首:《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第三十三卷:《九歌》二首:《少司命》、《山鬼》;《九章》一首:《涉江》;《卜居》一首;《渔父》一首(以上皆题名屈原作);《九辩》五首(未分篇);《招魂》一首(以上皆题名宋玉作);《招隐士》一首(题名淮南小山作)。总的来说,屈原作收录六种十首,宋玉作收录两种六首,淮南小山作收录一首,一共是九种一十七首。入选篇目之多,足以看出萧统对楚辞类作品的青睐,以及对《离骚》、《九辩》等富有代表性、极富个人面目的作品的独特观照,而《九歌》、《九章》中的个别篇目如《河伯》、《大司命》、《国殇》、《哀郢》、《抽思》等却未见入选。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楚辞类作品篇目入选而并未选全的原因。

一、楚辞类作品问世以来的经典化

任何文学作品被收录入选本,在此之前必定经过了自身的经典化,被人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类作品亦然。自问世以来,“屈宋诸作”不断被发掘,尤其是汉代以来,《离骚》等作品的价值被不断发现与赋予,其作品中包含的情志不断为人所接受,所以在战国到南朝梁这极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些作品得以保存,萧统才有机会将其选入《文选》。

(一) 汉代楚辞的经典化

有汉一朝开国之君为楚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文化的基本走向。汉在文化方面对楚有极大的继承,汉初高祖有《大风歌》,其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明显可以看出楚歌的风味。《史记》当中有“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2]的记载,这段话本身载有两个重要信息:一,据熊良智先生考证,这段记载是现存最早出现“楚词”二字的资料^[3],说明在汉武帝前,以屈赋为代表的作品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粗糙的选本;二,统治者(汉武帝)本人也雅好屈骚,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班固《离骚序》曰:“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4],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5],都说明汉武帝对楚地文学的偏好。

作者简介: 张智涵(2004—),男,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美学;

田子扬(2004—),男,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日本文学。

通讯作者: 张智涵

从文献角度看,在东汉,《楚辞》这一作品集被正式辑录出来并且流传于后世,今本洪兴祖《楚辞补注》题为“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6],正是由刘向所辑,刘向在楚辞学的功劳还不止于此,班固《汉书》“十志”之中有《艺文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录,而《艺文志》整体袭刘歆《七略》,《七略》又是据其父向之《别录》而来,《艺文志》之中有诗赋略,下有“屈原赋”之属,故有理由认为刘向从目录学的角度将屈赋记录下来。

从经学的角度来看,王逸《楚辞章句》题名为“离骚经”,在原有的“离骚”后增“经”字。经者,法也。而关于其称“经”具体是在汉代的何时,李大明先生已经总结了六种说法^[7]。值得再思考的是,汉是经学大盛的时代,经学在汉代也经历了今、古文经学的变迁,所以《离骚》之成为“经”,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而非固态的过程。冯良方先生分西汉中期“萌而未明”、西汉后期可能正式称“经”、东汉前期称“经”之反动、东汉后期称“经”之完全系统化四个时段来讨论^[8],而《离骚》“兼好色不淫、怨排不乱,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从经学的角度也较容易理解其经典化。

(二) 汉末魏晋以来《楚辞》地位的抬升

有汉以来,人们对《楚辞》的认识不断加深,《楚辞》的地位也不断抬升,《汉书·王褒传》有“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9]的记载;至东汉,刘向集《楚辞》,王逸述《章句》,这在楚辞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自此以后,王逸的《章句》影响愈广,地位愈高,逐渐取代当时流行的其他本子,一家独大,所以今人得见的汉代《楚辞》注本只有刘向集、王逸章句的十七卷定本,其他都已亡佚。自此以后,学者研究《楚辞》就走上了标准化的道路。

魏晋以来,社会巨变,鸿都门学兴起,这一时期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0]。文学逐渐从经学之中剥离,不再成为经学的附庸,故自魏晋始,文人谈《离骚》,不必完全再从“经”或“不经”谈起。学者更倾向于从《楚辞》作品本身去谈论其价值。

魏晋以及六朝时期的学者从广域视角对《楚辞》进行了文体之辨,在此之前,“赋”与“骚”界限不明,常常混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2];又其《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11];《汉书·贾谊传》“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9],又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下有“屈原赋”之属,这些都说明直到东汉,学人将“骚”与“赋”仍然视作一体。魏晋诸人对于各类文体所应当具有的特征都有相应的论述,曹丕《典论·论文》曰:“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2]晋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12],都说明当时文人对不同文体所承载的内容与情感有了一定的认知,但是其人明显还是未区分汉人所作之赋与屈宋所作之骚的区别,至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站在文学的发展史上,对“骚”与“赋”进行了源流上的考辨。

《文心雕龙·诠赋》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5]其认为“赋”之名出于《诗经》之“六义”,重视文辞之典丽富美,通过“铺采摘文”来“体物写志”,虽然在这个层面同于《诗经》“赋”之“铺也”,但其是由于沿着《楚辞》的路子才得以发扬光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才是赋体的正源。在此之前,以班固等为代表的学者多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9],而刘勰以《楚辞》为赋体之源流,将其地位大大抬高,足以说明其对《楚辞》的重视。又《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5]将《楚辞》列为“枢纽”之一,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阐释执正之理,《正纬》、《辨骚》阐述馥奇之理,合起来构成执正馥奇的观点^[5],着重强调了《楚辞》相较于《诗经》变多于复的创新性,与纬书类似,是正统之外的一朵奇葩,《文心雕龙·辨骚》篇开头就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5]是楚人多才,金相玉质,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昭明文选》独列“骚”类

按《昭明文选》之体例,第一类为赋,其次是诗,接下来便是骚,不可不曰对《楚辞》有独特的观照。刘师培《论文杂记》曰“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13]在刘师培先生看来,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将“骚”与“赋”作了源流上的考辨,但是真正将“骚”与“赋”分开,是《昭明文选》开其先河,这一说法较为妥当。而关于昭明

太子萧统为何要将“骚”独立出来，应当是受到前人的影响。《梁书·刘勰传》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14]，可见刘勰与萧统有过交往并且萧统对刘勰的文学观点有所接纳，故有学者以为萧统《文选》将“骚”单独列为一类当是受到刘勰的影响^[15]；又傅刚先生通过对比任昉《文章缘起》与《文选》具体的文体分类，发现从著录的文体名称上看，《文章缘起》同于《文选》及《文选序》的多达五十七种，^[16]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巧合，任昉作为萧统文学集团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自然会对萧统造成巨大的影响。

二、昭明太子的文学观念

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面提到：“夫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17]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昭明太子大致的文学观念。“典”，即行文太过质实，没有文采，萧统以为，文章如果毫无修饰则会流于粗野，太过华丽又会伤于浮艳，真正好的文章就如同孔子所云，同时注重内质于外在，有君子的风致。昭明太子在进行篇章选择时也有意从“典”与“丽”两方面去进行选择。

（一）“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总标准

《文选序》一文集中体现了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的标准，其中萧统提到：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18]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总结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编纂总标准。“沈思”强调思想性，“翰藻”强调文学性，清代学者阮元据这句话进行了发挥：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19]

既然题名“文选”，其选篇必然与要符合昭明太子所认为的“文”，前文提到，汉人重“骚”，往往是因为其认为《楚辞》在申述形式上“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同于《诗经》“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风教形式，而在情感内质上，屈原之忠爱沉郁也与儒家的经义相符，所以“依经论骚”的观念将《楚辞》与经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文选》选入《离骚》诸篇，萧统明显不是从“经”的角度来理解楚骚。《文选序》单独有一段称赞屈原的话：“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18]萧统称赞屈原诸作皆产生于耿介忠直之心，由于谏君不听，疏而不用，放于湘南，只能深思熟虑，将自己的拳拳忠心与郁邑之忧通过文字勉强排除。

《离骚》全文近三千字，先叙祖父之煊赫，自己更是“内美”而又重“修能”，其目的正是要继承“三后之纯粹”，“及前王之踵武”！未曾想楚国的庙堂已经尽是权奸沉湎一气，众芳芜秽，不厌求索，不仅如此，群小还到君王面前中伤他人，导致屈原被疏远。经过一系列的“陈词”过后，屈原开始了其“三次飞升”，在“飞升”过程中，分别求“宓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而皆不得，在面对“去”与“留”时，屈原又命占于灵氛，求问于巫咸，得到相同的结果后，屈原最终决意离开，“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在一切准备停当，即将发轫之际，忽然“临睨夫旧乡”，楚国曾经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割舍，故最终屈原决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借助浪漫奇特的想象外衣抒发忧君爱国之思，司马迁称赞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沉思翰藻，可谓兼之矣，故钱穆先生认为，纯文学作品当自屈子《离骚》始^[20]。而从《文选》所收录的所有作品来看，屈赋是《文选》中绝少的作于战国的作品，说明萧统对“金相玉质，百世难匹”的《楚辞》的偏爱。

（二）符合“篇什”的体制

除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这一总标准之外，萧统《文选序》中还提到了其在选文体制上的要求：“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如果非独立成篇、有连续性的文本，则不入选。这一标准主要针对史部文献而言，《文选序》云：

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18]

史部文献之中如《史记》者，虽然也是“发愤沉思”，融入了太史公的思想，语言上“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9]，但是由于其体量庞大，创作时多使用“互见法”，如在描写项羽时，《项羽本纪》主要突

出了项羽的年轻气盛、英勇慷慨，其自刎乌江的结局令人唏嘘；而在《高祖本纪》中写项羽的鲁莽残暴，两篇需要对看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项羽。史传不易拆分，且其本身已经合为集，如果再进行选择，恐有重复之嫌，故不选之。

而以屈骚等作品并非一问世就有《楚辞》的集子，直到西汉前期，屈骚仍然多以单篇流行于世，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评述时亦云：“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其所例举，皆单篇作品，独不云“余读《楚辞》……”^[2]，说明直到司马迁的时代，仍然没有一个众人都接受的《楚辞》选本。不独《楚辞》一种，其他诸子著作在前汉亦多以篇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周“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2]而这些集子的辑录，大多要归功于刘向刘歆父子^[21]。

《楚辞》中即使如《九章》者，也还需要分成九个独立的篇章看待，每篇的抒情都有其侧重点，并不能一概而论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对《楚辞》中的主要作品风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轶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5]《文选》骚类所选全部篇目为《离骚经》、《九歌》、《九章》、《卜居》、《渔父》、《九辩》、《招魂》、《招隐士》，除了《远游》、《天问》、《招隐士》外，其他皆同，笔者认为，萧统编选《文选》骚类，当是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有所参考。刘勰已经提到，《离骚》与《九章》在艺术特色上具有相似的风格，《文选》仅选入《九章》中的《涉江》一章，这或许与刘勰的观点有关联。

（三）“并为入耳之娱”，“俱为悦目之玩”的接受视角

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汉以来，不同的人对文学都有不同的接受视角，《诗大序》认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放大文学的风教功用，其把补察时政，泄导民情当作文学最大的功能；扬雄认为“诗赋小道，壮夫不为”^[22]，尊经而抑文，同意“作文害道”，将诗赋视作无用之物；曹丕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努力抬升文学的地位，意欲尽力排除经学的影响，并将文学与经学相等而观。萧统也有自己的接受视角，《文选序》云：

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18]

萧统认为，陶匏诸器不同的乐器与黼黻等不同的文彩，目的都是为了听觉以及视觉上的愉悦，文章之道亦然，作文的目的是让人在闲暇之余“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得到心灵上的放松与审美上的愉悦，这一条主要针对经部和子部文献。《文选序》对于不选的理由也有更为具体的论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5]针对诸经，萧统给出的理由是经者，常也，法也，能够同日月争光，可以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一字不可删改，由是而不选。前面引清人阮元语，萧统之名《文选》，即非文不选之意。今人常将“诗骚”合称，将二者皆视作诗体，而萧统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5]与其说萧统将《诗经》看作文学，不如说将其视作指导文学的纲领。而子部不选的原因也十分清楚，老庄、申韩、管孟诸家，其著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而是在于申述自家的学说。日本学者藤野岩友在谈《楚辞》之意义时曾经提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散文全盛的时代，北方诸国绝多散文，惟南方楚地屈子一家主韵体诗谣^[23]。春秋战国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闻其风而说之”的时期，诸家为了光大己学，自然不可能用宜于抒情的韵文诗体娓娓道来，而是要选择最能够切中肯綮切中要害，且词气激烈夺人眼目的散文体来进行写作。诸子散文之中虽然有庄周之奇诡超玄，韩非之肯慎缜密，可谓沉思而备瀚藻，且其在最初也是以独立篇章流行，但是其作皆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故不之选。

三、《楚辞》篇目入选具体依据分析

前文已说，《文选》骚类所选全部篇目为《离骚经》、《九歌》、《九章》、《卜居》、《渔父》、《九辩》、《招魂》、《招隐士》，其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引除《远游》、《天问》、《招隐士》三章不同外，

其余皆同，故萧统编选《文选》骚类，当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有所参考，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依据。以下作者将从多个方面分析论证之。

（一）屈原诸作入选依据

胡刻本《文选》骚类题名屈原作者有：第三十二卷：《离骚经》一首；《九歌》四首：《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第三十三卷：《九章》二首：《少司命》、《山鬼》；《九章》一首：《涉江》；《卜居》一首；《渔父》一首。《离骚》之入选自然是当仁不让，毫无异议，值得注意的是，《文选》选入《离骚》，依旧从王逸《楚辞章句》在“离骚”后加以“经”字，萧统当然不认为《离骚》是“经”，而仍留“经”字的原因除了保存作品原貌，尽量不加以删改的考量外，恐怕更是将《离骚》当作统率骚类的纲领。

《九章》仅录入《涉江》一篇，《九章》九篇在内容上并无明显的联系，甚至是在西汉时可能还无“九章”之名，因为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屈作时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独列《哀郢》而说不《九章》，关于这一点前人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论述^[1]。《涉江》之所以能够入选，或是与其旨趣有关，不少研究楚辞的学者认为《九章》之中，《涉江》成就最高，因为其最能够接续《离骚》的踵武^[24]。《涉江》之一开始也是从自己写起，美己之德，后因遭谗放逐，有大量表露内心的文字，到末尾，又有了“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的感叹，这一句正与《离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同。《九歌》十一章入选六章，萧统或是考虑到代表性的问题，东皇太一是楚国的至高神，在中原地区此神希见，故选之；而《湘君》、《湘夫人》也是因为独具湘楚特色而被选入；至于《国殇》、《礼魂》、《河伯》诸篇，要么是重祭礼而轻文学，要么是不具备代表性且有重复之嫌，故未之选。《卜居》、《渔父》，集中体现了屈子去留的纠结，对后世影响深远，故亦选之。

（二）屈后诸作入选依据

屈原之后，有宋玉《九辩》五首（未分篇）与《招魂》一首；淮南小山《招隐士》一首。宋玉是一般认为的第一位接续屈原踵武、发扬楚骚的作家，《九辩》被认为是宋玉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人多以之与《离骚》对看，宋玉在《离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发挥，形成了个人面目。《离骚》重在写谏君不听反放逐的忧思与去留的盘桓，而《九辩》重在发“坎廪兮贫士”之幽愤，其中“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傴僂”之语，开有汉贾谊、相如之先河，对汉代骚体赋的形成与成熟影响深远。《招魂》“耀艳深华”，清刘熙载《艺概》论曰“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25]，《招魂》铺张扬厉，极力渲染四方之恶与楚国饮食、宫殿、歌舞之美，《七发》则“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两者结构、内容等诸多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对后世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影响深远，故亦选之。

另外，屈骚“后语”之中，除宋玉一人之外，还选入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王逸《楚辞章句》除此篇以外，汉人所作另有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等，皆不选。原因可能在于他人之作，皆托屈原《离骚》之体而拟之，借其事以抒己之邑郁。而《招隐士》一篇不同，其写作虽亦皆骚体，却通篇无哀怨狭仄之气，刚健宏博，是欲表达出其吐握之诚将隐士招徕。另外，《招隐士》虽为淮南小山所作，按其语气，表达的应当是淮南王安的心思，刘安及围绕其形成的“淮南学派”是汉初重要文学集团之一，淮南雅好文学，《文选》的编纂者萧统亦然，昭明太子录入此篇，或许还有欣赏淮南王学术与思想的意味在其中。

文选是中国古代文献传播与艺术批评的重要方式，体现出了选人的文学观念，昭明太子“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观点影响了其对周以来文学作品的选择，“骚”在《文选》之中独列一类体现出了萧统对楚辞的重视，这不仅是由于汉代以来楚辞经典化，而且也在于楚辞情志与萧统内心的契合。在《文选》的时代，人多以《诗经》与《楚辞》并提，钟嵘《诗品》言：“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诗骚”合称渐为人所熟知，成为了中国文艺的重要传统之一。

参考文献：

- [1] (宋)朱熹著、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2] (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 [3] 熊良智：《楚辞成书与经典建构》，发表于《智慧中国》2021年第11期。
- [4] (汉)王逸著、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 [5]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6] (宋) 洪兴祖补注、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7] 李大明:《<离骚>称“经”时间新论》,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二期。
- [8] 冯良方:《汉代<离骚>称“经”的四个演进阶段及其与经学的关系》载于《——二〇一七年云南昆明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七届年会论文集》,2017年。
- [9]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 [10] 鲁迅著、刘伟责编:《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1] (清) 吴楚才、吴调侯编、钟基、李先银、王身刚译注:《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 [12] 郭绍虞著:《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13] 刘师培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14] (唐) 姚思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 [15] 曹道衡:《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载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四期。
- [16] 傅刚著:《<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17] (清) 严可均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 [18] (南朝梁) 萧统著、(唐) 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据胡克家本影印。
- [19] (清) 阮元著、万仕国、卢娴点校:《阮元集》,扬州:广陵书社,2021年版。
- [20]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 [21] 王欣夫述:《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22] 孙过庭《书谱》引扬雄语,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 [23][日]藤野岩友著、韩基国编译:《巫系文学论——以<楚辞>为中心》,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 [24] 陆侃如著:《屈原与宋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25] (清) 刘熙载著、袁津琥注:《艺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Analysis of the selection basis of ' Chuci ' in ' Wenxuan '

Zhang Zhihan, Tian Ziy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As China 's existing compilation of the first literary anthology, " Wenxuan " can not be said to set a model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literary anthologies, and even developed a new knowledge-choosing. Zhaoming Prince Xiao Tong and his literati group chose literary works between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Six Dynasties.Finally, more than 700 work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tyle and compiled into ' anthology '.When choosing works, Xiao Tong also had a more unified classification basis. Therefore, there was a situation in which Chu Ci articles were selected but not selected.

Keywords:'Anthology ' ; xiao Tong ; 'Chuci ' ; Selection of learning